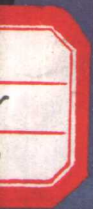


中外名作家 自杀揭秘



陈辽 冉占彩 主编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中外名作家自杀揭秘

主 编：陈 辽

副 主 编：冉占彩

编辑委员：冉占彩 吴 锦

陈 辽 徐采石

张子清 秦家琪

顾复生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李建丰

封面设计：速泰熙

中外名作家自杀揭秘

陈 辽主编 冉占彩副主编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西坝河
东里77号楼底商5号
(邮政编码：100028)

经销者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刷者 江苏省丹阳市文教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毫米32开

字 数 250千字 10.5印张 2插页

版 次 1991年8月第1版

印 次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0册

书 号 ISBN 7—80074—535—x/G·108

定 价 5.05元

多层次地研究作家自杀现象（代序）

陈 辽 冉占彩

三毛自杀，海峡两岸的文艺界议论纷纷。在大陆竟先后有七、八家出版社出版有关三毛的书，以满足读者了解三毛因何自杀的渴望。这也并不奇怪，自“文化大革命”结束至今，大陆还没有一位作家自杀过，台湾名作家自杀也属仅见。然而，很少有人思考这么一些问题：作家自杀，是种什么现象？撇开纯属个人的原因有无共同性的原因？我们该怎样正确对待作家的自杀？这里，谈谈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基本认识。

一、作家自杀是一种文化现象

孤立地看这个、那个作家的自杀，各有各的原因，但如果把中外名作家的自杀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作家自杀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和作家所属国家的文化心理、社会条件、政治经济因素都有密切的联系。一个国家、一个时期的作家的自杀，无不都是该国家该时期的文化心理的表现，并受到社会条件和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所以，同样是作家自杀，中国作家的自杀和外国作家的自杀不同，古代作家的自杀又和现当代作家的自杀有别。

拿我国古今作家的自杀来说。据现有资料，中国作家自

杀的人数是绝少的。从我国第一个自杀的作家屈原开始，到新中国成立，我国自杀的作家不超过三十个，平均一百年才有一个作家自杀。不到万不得已，中国作家是不会选择自杀这条道路的。这不能不说和儒家的文化心理有关。儒家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也。自杀，显然不符合这种文化心理。但在大是大非前面，中国作家又不惜以死抗争。屈原眼见楚国被昏君和奸佞之臣统治，救国无望，而他又不愿意和这些人同流合污，于是自沉于汨罗江。刘安不满汉武帝独断专行，又不愿受辱，乃以自杀表示对汉武帝统治的反抗。宋元之际、明清之际，有若干个作家自杀，全是出于民族大义。他们决不当亡国奴，也绝不屈身受辱，于是或绝食而死（谢枋得），或投水而死（陈子龙），或自缢而死（倪元璐），保持了人格的尊严和民族的气节。除唐代诗人卢照邻因不堪长期疾病的折磨投水自杀外，民国以前我国自杀的作家全都主要出于政治原因。

民国以后，特别是“五四”以后，西方哲学文艺思潮进入中国。我国的文化心理开始有所变化。因此，“五四”以后我国自杀的作家和过去自杀的作家也大不相同。王以仁自杀是因为失恋；朱湘自杀是因为经济困窘，在生活中找不到

自己的位置；王国维自杀，除了其它原因外，西方的尼采、叔本华哲学、维护人的尊严的思想以及“壮美”的美学观，是促使他走上自杀道路的一些重要原因。这说明，民国以后我国作家自杀的文化心理、社会条件 and 政治经济因素都和过去不同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老舍、闻捷等一批作家自杀（其数量超过了我国以往自杀作家的几倍），那是他们以自杀来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表示最强烈的抗议。另一方面，“士可死而不可辱”的儒家文化心理也起作用。“文革”一开始，老舍就对他的儿子说：“又要死人啦，特别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他的儿子舒乙说得对：“在‘文革’中对他来说，只能有这个‘舍予’式的结局。”于此可见，中国作家自杀是中国的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反映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又是中国的社会条件、政治经济因素起作用的结果。

西方作家自杀多半在十八世纪以后。那时，资本主义已确立了它在西方的统治，资产阶级的自由观、价值观在作家中也居于主导地位。一方面，作家们把追求个人的自由、一己的尊严作为生活的鹄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

式、生活方式又像桎梏一样紧紧束缚了社会上的单个人，作家的创作本质上是不自由的，生活也是不自由的。所以，敏感的作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常常感觉到生命的不能承受之重，活得很累，精神上很痛苦。美国女诗人普拉斯年纪轻轻就已在内心世界飘浮过轻生的乌云。美国的五位自白派诗人，即有三位以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自杀的念头也纠缠着海明威不放：“每当我情绪低落，我总会想到死和种种不同的死法。我想，除非你能设法儿让自己一睡不醒，要不最好的死法恐怕还是在夜晚从轮船上走进茫茫的大海。”虽然，后来海明威是以12口径猎枪打飞了自己大半个天灵盖的。“腰缠万贯的无产者”杰克·伦敦在《珍珠人》创作手记中写道：伪善与秘密的罪恶纠结在一起统治着社会，国家政体及法律诸神不过是些自以为是的冒牌货；在一种没有得到有效管理的经济中，劳资之间的斗争十分荒谬；人既是野兽，又是天使，有限而懦弱地活在世上，追逐金钱；要是人能凭着美好的情感和理性活着，他就能成为地球的主人，星星也会对他俯首贴耳。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凭着美好的情感和理性活着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最后还是以自杀离开人世。投海自杀的诗人哈特·克莱恩，固然有他自杀的个人原因，

而最终促使他自杀的无疑是他和美国社会的不可调和的对立！美国自杀的作家特多，这是根本性的原因。

暴发户的美国和严肃思考的作家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解决的。但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里的作家命运並不更好些。他们中也有不少作家以自杀结束一生。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自杀前精神已经崩溃；法国名作家莫泊桑用裁纸刀割开了自己的喉咙；西班牙作家马利亚诺·拉腊的住宅里响起沉闷的枪声；德国剧作家克莱斯特和陪伴着他的亨里特·福格同归于尽；奥地利著名作家斯特凡·茨威格则和他的妻子一起自杀……。他们的具体死因各不一样，而导致他（她）们自杀的文化心理、社会条件 and 政治经济因素则是差不多的。

日本，既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又有东方文明的传统，但日本自杀作家之多却是惊人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川端康成在获奖后的第三年，口中含着煤气橡皮管自杀。他的自杀震动了世界文坛。在日本现代文学史里，一百年间自杀而死的作家即有七、八位：北村透谷、有岛武郎、芥川龙之介、牧野信一、太宰治、田中光英、三岛由纪夫等。日本自杀作家如此之多，一方面根源于资本主义与有创造精神的作家的对立，另一方面也和日本在生死问题上特有的文化心理有关。

日本人认为，死是生之延续，死是道德的自我完成，是一种修身律己的行为。如果需要，似乎随时都可以去死。由生到死，仿佛是从一种境界走到另一种境界，就像出门旅行一般。如此文化心理，加剧了日本作家自杀现象的发生。

拉丁美洲国家从上世纪起，进入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轨道。与此同时，作家自杀现象也随之产生。乌拉圭名作家奥拉西奥·基罗加、秘鲁著名作家何塞·玛利亚·阿尔格达斯都走上了自杀的道路。至于苏联作家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自杀身亡更是人所共知的。他们的自杀，都有他们国家的文化心理的烙印，也都有政治经济因素和社会原因。

总之，作家自杀是一种文化现象。无缘无故的自杀是不会有。作家的自杀总是凝聚了他们所属国家和所处时代的文化心理，同时总有政治经济的因素和社会原因。所以，研究作家自杀这一文化现象，有助于了解作家自杀时某个国家的文化心理、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

二、要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作家自杀现象

作家自杀以后，作家的一生就成了历史，他过去所写

的、所说的、所做的一切，也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因此，还得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作家自杀现象。

在人类的蒙昧、野蛮时期，不存在自杀问题。相反，在一些原始部落里，老人失去劳动能力后还被同部落的人吃掉。即使在原始社会后期，也不曾发生过自杀现象。有人自杀，是在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即阶级社会产生以后。当阶级剥削、集团斗争导致人们无法生存下去时，死去比活着好，这才出现自杀。至于作家自杀更是在精神劳动和物质生产劳动分离和对立以后，作家觉得他的创作已不再有意义以后，这才发生自杀行为。战国时期，我国才有第一个作家屈原自杀，并不是偶然的。作家自杀是历史的产物，不是从来就有的。

就单个作家自杀来说，他的自杀也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在他的作品和言论中或多或少已经透露出自杀的信息。屈原在《离骚》中就写道：“鸱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同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唐代诗人卢照邻在《释疾文》中说：“先朝好吏，予方学于孔墨；今上好法，予晚受于老庄。”说明他在政治上不得志，并受到老庄虚无主义的影响，

所以他后来果然身患恶疾，痛苦不堪，自沉颍川，有其历史根源。宋末诗人谢枋得在被强送大都前，就写了这么一首诗：“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纲常在此行。天下久无龚胜洁，人间何独伯夷清？义高便觉生堪舍，礼重方知死甚轻。南八男儿终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透露了他必死决心。陈子龙在投水自杀前也曾写诗以明志：“生平慷慨追贤豪，垂头屏气栖蓬蒿，固知杀身良不易，报韩复楚心徒劳，百年奄忽竟同尽，可怜七尺如鸿毛。呜呼七歌兮歌不息，青天为我无颜色。”王思任《避园拟存律》中有两句诗：“于忠肃墓社稷留，还我头颅掷与君”，表示了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报国之意。现代作家王以仁在《孤雁》的六篇小说中，几乎每篇都写到了主人公想自杀的念头。而王以仁在《代序》中说，作品中所写人物的事迹，“我永远承认是我自己的事迹”。王国维还不足三十岁就写了《书古书中故纸》一诗：“昨夜书中得故纸，今朝随意写新诗。长捐篋底终无恙，比入怀中更足奇。黯淡谁能知汝恨，沾涂亦自笑余痴。书成付于炉中火，了却人间是与非。”按照学者缪钺的说法，该诗表明，王国维心中已“潜伏自杀之念”。老舍在作品中先后写过十多人的自杀，但他笔下的自杀者都死得刚

烈、倔强，所以他在“文革”中以自杀表示对极左路线的抗议也有其历史原因。

中国作家自杀是如此，外国作家自杀又何尝不是这样？！美国女诗人普拉斯在她死后才发表的长诗《拉撒路夫人》中写道：“我又自杀。每十年一次，我设法安排它——”还说“死亡是艺术，像其它的一切。我干得特别出色。”海明威在30年代就在一篇小传里提到：“自杀，就像运动一样，是对紧张而艰苦的写作生活的一种逃避。”杰克·伦敦生前就想写关于死亡的书，书名就叫《我们的死法》，写五种人临死时的故事。在他看来：“人生是一只薄壳鸡蛋，像仙境一样脆弱……”哈特·克莱恩在自杀的十多年前就写过这样的诗句：“……有一条线 你不能跨越…… 大海的心残酷无情。…… 快点 趁还能感受到——睡眠，死和欲望赶紧把自己锁进那漂游的花朵。”十年后，他果真跳进大海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自杀前半年1940年10月2日写道：“我是否应该想想死的问题了。”但是，当时她“还不想死”，而在半年后却想死了，真的自尽了。莫泊桑小说《奥尔拉》的主人公得出自杀的结论是和莫泊桑写作小说时寻求摆脱他的极其痛苦的精神病的出路相一致的。拉腊在1836年11月2

日写作的《死人节》中写道：“我突然感到一阵眩晕，我终于发现，这墓地就在马德里城内，马德里就是一块坟地，这是一座巨大的陵墓，每一个家庭是一个墓穴，每一条街道埋葬着一个历史事件，每一颗心灵是一个希望的骨灰盒。”此时，他已万念俱灰了。用不到再多加引述，每一个作家的自杀都有其历史根源，都有个历史发展过程。因此，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从历史的层面上探讨该作家自杀的历史原因和历史发展过程。如此，作家的自杀现象就不只是茶余酒后的谈话资料，也不只是作家的奇闻轶事，而是一个严肃的研究课题，从一个作家的自杀可以观照该作家的历史，观照该作家所属国家和所处时代的历史。

从历史的层面研究作家的自杀现象，还要探索作家的自杀对历史产生的影响。屈原自杀，培育、启发了我国作家的清浊之辨和以生命对抗邪恶的斗争精神。我国作家无意义的自杀极少。海明威自杀后，西班牙最杰出的斗牛士胡安·贝尔蒙德在听到这个噩耗时慢慢地、清晰地说道：“干得好！”接着他也用同样的方式了结了自己的一生。苏联作家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的自杀，对于我国“文革”时期一批作家的自杀不可能没有影响。而宋元之际、明清之际一些

爱国作家的自杀，更激发了抗元斗争和抗清斗争的熊熊大火。当着我们不只是从文化层面而且还从历史层面对作家的自杀现象进行探索时，我们就能透过作家自杀现象求索到更多有价值的东西！

三、从哲学的层面进行思索

仅仅从文化、历史的层面考查作家自杀现象还不够，需要从哲学的层面对这种现象进行思索。

首先，对生命进行自戕绝不是小问题。尤其是作家并非愚夫蠢妇，他要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且是由他自己来结束自己的生命，通常是有哲学思想作指导的。有的自觉，有的不自觉，但我们对作家自杀进行思考时却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屈原是有自己的哲学思想的，不仅写了《离骚》，而且写了《天问》，对于自然现象、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提出了一百几十个问题，贯串其中的是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他对生死问题也早有考虑：“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他绝不贪恋长寿，而是“恐修名之不立”。他后来自沉汨罗江，正是为了“立”“修名”。谢枋得对向他劝降的魏天

佑说：“司马子长说过：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韩退之说过：盖棺事始定。足下岂足以知此？”他对生死问题也早有哲学意义上的思想准备：“义高便觉生堪舍，礼重方知死甚轻。”一般地说，中国作家自杀并非轻生，而是把生命看得很重，但是为了崇高的理想、美好的生活，必要时他们可以贡献出自己的生命。

外国作家有明确的哲学思想的不多，但外国作家自杀也受到他的哲学思想影响。海明威受悲观主义哲学影响很深，他在《午后之死》里悲观地宣称：人生的一切都无可救药，唯有死才是种种不幸的最好补偿。莫泊桑也被悲观主义哲学所渗透，他叹息多少人，包括自己在内，都被“丑恶的偏见、比罪行更令人厌恶的关于名誉的口是心非的理解、堆积如山的伪善感情、装模作样的体面、可恨的功名心所压迫、俘虏和毁坏，因而时刻流露出深深的悲哀。拉腊在对现实的看法越来越悲观以后，将希望寄托于宗教，宣称宗教对每个国家是必要的，是一切秩序和道德的源泉。然而，宗教也没有能够将他从悲观绝望中挽救过来。克莱斯特同样是对生活绝望，他自杀前给亲戚朋友写信，其中一封这样写道，“我的心灵受了伤，以致使我，我大概想说，就连把鼻子伸

出窗外都会感到被阳光照射得灼痛难耐……”因此他把死亡当作一种解脱，一种进入天堂的享受。用不到举更多的例子了，西方作家自杀许多是因为悲观主义哲学主导了他们的思想才走上绝路的。

这种悲观主义哲学，在资本主义走下坡路以后，几乎是有教养的人们的一种通病。作家受悲观主义哲学的影响尤其大。即使是拉丁美洲的作家，也被笼罩在悲观主义哲学的阴影中。基罗加在他给友人的信中写道：“……纵观我这一生，死神总是在我的周围转悠……它不时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出现在我的笔下。现在它似乎已经朝我本人逼近了……”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生活在新旧交替的时代，虽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活了一段时间，但都没有摆脱悲观主义哲学，陷入深深的内心矛盾之中，最后走上了自杀之路。可以说，西方的悲观主义哲学是导致一批西方作家自杀的重要原因。

从全体上看，我国作家自杀大多是以积极的精神进行抗争，而西方作家自杀大多是以消极反抗的态度逃离资本主义现实。所以，我们虽然不提倡自杀，但对于已经自杀了的作家，我们是抱有同情态度的。

今年三毛自杀，我国文艺界再没有人对之进行谴责了，

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文化心理的一种进步。自杀，说到底是对死亡方式的一种选择。一个人有生的权利，也有死权利。我们倡导为人民利益而死，为国家利益而死，反对随便轻生，但也尊重一个人对死亡方式的选择。人所共知，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拉法格和马克思的女儿劳拉夫妇俩在晚年是双双自杀身死的，因为他们觉得再活下去将成为党的负担，不再有意义。于是他们选择了自杀的方式。对此，无论是列宁还是其它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怪罪过他们夫妇俩。所以，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要研究作家自杀现象，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作出正确的“他们为什么自杀”的回答！

一九九一年四月于南京

后记：本文引用了本书中一些文章的资料，特此说明，并向作者们致谢！